



吉卜赛主义概论

JIBUSAIZHUYIGAILUN

隐秘战线 著

· 红色中国 ·

吉卜赛主义概论

隐秘战线 著

· 红色中国 ·

目 录

导言·····	6-7
“八九六四情怀”与“民主化”神话的破灭 ·····	8-11
请客、斩首——收下当狗 ·····	12-13
“精神腺刑”与行为艺术——第二代自由派 ·····	14-16
互联网“键政”元年与新自由主义的“阿登反击战” ·····	17-18
中国资本主义对自由派衍生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废物再利用” ···	19-21
“素人”与“老牌” ·····	22-24
“美帝国制裁大棒始挥起，中资半外围凸钉终落平” ·····	25-27

导 言

在这个世界上，恐怕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拥有像中国的小资产阶级这样的“吉卜赛主义”精神了：将自己的民族视为“支那奴”，将“逃”往西方，接受既不民主，也不自由，更不公平的资产阶级专政制度视为“脱支”。这样的“吉卜赛精神”，让那些在西方新闻媒体上频繁露面抨击北朝鲜的“脱北者”们都大为震撼。

将中国的逆向民族主义单纯地视为一种思想，在笔者看来这是对逆向民族主义的一种陈旧的、肤浅的认识；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低估了逆向民族主义所带来的短期及长期危害。

之所以将逆向民族主义思想升级为“吉卜赛主义”，是因为笔者认为中国的逆向民族主义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产生，90年代初便已经成型——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在中国小资产阶级成员之间广泛存在并认可，而且十分成熟的意识形态。

“认为自己的民族不如其他民族优秀”，仅仅只是中国小资产阶级吉卜赛主义中的逆向民族主义这小小的一部分。实际上由于这种思想是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外国国家身份加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条件下产生的——因而与西方新自由主义反动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

吉卜赛主义者显然是认同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的，并觉得中国也应该走上这条反动的道路，但是这群人不认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哪怕一丁点实际运用——因为“支那人”不配享受什么“民主制度”，也无权拥有什么“言论自由”。很显然吉卜赛主义者认同的是在中国实行冷战时期南美的阿根廷和智利，韩国的朴正熙

与全斗焕那样的，全面听从西方主子指挥的傀儡军政府（而且对内还大概率还比国民党跟侵华日军残暴）。

到这里我们便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不就是今天的中特吗？是的，可以说中国吉卜赛主义者梦想在中国实现的制度其实早已经实现了，但是为什么今天的他们仍然是中特政府表面上的反对者呢？笔者将在未来的内容中，尝试从社会、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尝试分析当代中国逆向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敬请期待！

零

“八九六四情怀”与 “民主化”神话的破灭

如果不彻底打破自由派，以及中国国内相当大一批受自由派思想影响的小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度能够在中国实现”的幻想与渴望，就永远无法摆脱小资产阶级“吉卜赛主义”对中国人民在未来的阶级斗争乃至社会主义革命浪潮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不能理解自由派小资产阶级的“八九六四情怀”，自然也就无法理解“吉卜赛主义”小资产阶级在当下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行为与思想逻辑。

对于红色中国网的同志们而言，“八九六四”的前因后果想必已经不需要我再花费笔墨为大家详细讲述了。这场发生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最终以中特化身“张泰玩”，对北京的自由派学生及全国已经吃到“二茬苦”，受了“二茬罪”的无产阶级群众“逐一发送坦克”而结束。每一位上了年纪的老自由派在回想起这一段历史的时候，都不免会感叹“自由民主对中国而言，在那一刻是多么地触手可得”。

然而真的如此吗？基于我在红中网所阅读到的关于此事的资料，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反对中特政权的浪潮最终能够在1989年成功起势，一个主要原因便是无产阶级群众与自由派学生这两大在意识形态上横跨大半个

光谱的群体，在运动初期就反对中特政权之间默契地达成了一致——其中前者通过早期的政治动员充实了后者的基础（尽管二者追求的目标相去甚远）。而这场运动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自由派学生出于政治上的短视和对无产阶级群众所持意识形态的仇视：在后者准备展开进一步政治动员之时，做出了果断与其切割的迷惑操作。这使得自由派示威学生瞬间丧失基群众础——而中特正是看到了二者所结成的短暂政治同盟的破裂，果断决定武力镇压前者。

鉴于以上理解，我在这里向同志们给出我的一个新提法：

不能因为八九六四发生在1989年就将其与同年发生的东欧剧变混为一谈——这其实是东西方史学界乃至相当一部分包括马列毛主义者在内的左派对于此次事件的极为刻板的认识。

事实上在不包括苏联在内的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中，除波兰和匈牙利执行了部分私有化的政策以外，其余成员在戈尔巴乔夫叛徒集团上台后，均强硬地顶住了后者要求执行私有化的压力，直至东欧剧变爆发。¹

鉴于中特在毛主席于1976年逝世后即开始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且没有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受到来自苏东集团的干涉——而且中特也不是苏联的“卫星国”，因而将八九六四简单地视为东欧剧变的一部分显然是不合适的；而南斯拉夫解体与内战也无法与这一事件相提并论——因为南斯拉夫是一个在人口组成上高度巴尔干化的国家，且拥有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

1. 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杜布切克修正主义集团上台后，开始以“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之名，执行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政策。并于同年8月遭到苏联干涉后，古斯塔夫·胡萨克上台并实行“正常化”政策——将杜布切克时期执行的私有化及自由化政策全部推回。

关于匈牙利在卡达尔上台后执行的私有化政策，毛主席有言“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出自《念奴娇·鸟儿问答》）

关于波兰执行的私有化政策，主要始于哥穆尔卡时期。

那么可不可以对标智利、阿根廷以及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国89年的民主化运动具备一个性质，这个性质是以上三国的民主化运动都不具备的：由严重经济问题所引发的政治运动。智利、阿根廷和韩国这三个国家在8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相较8964而言，可以说是因纯粹政治问题（军政府独裁）所引发的政治运动（这一描述是否真正符合阿根廷的真实情况还有待讨论）。因而对于笔者而言：

“八九六四”对标的不是东欧剧变还是其他什么军政府独裁政权所面对的民主化运动，而是发生在1993年的俄罗斯宪政危机。

发生在1993年的俄罗斯宪政危机与发生在1989年的民主化运动之间的对比是十分直观的：事件爆发时两国都存在极其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也存在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只不过事件双方的组成与诉求大不相同（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联盟 VS 叶利钦；中：无产阶级群众—自由派学生联盟 VS 中特）。更奇妙的是这两起事件的结果都是资产阶级政府一方获得胜利。

本章总结：将中国的“八九六四”与俄罗斯的“九三危机”而不是发生在同年东欧剧变相提并论，的确是笔者在思想上的首创。当然了，这一结论所基于的意识形态以及思想认知可能与历史事实存在偏差甚至谬误——我并不回避这一点存在的可能性，也希望红中网的同志们愿意就这一观点进行讨论，鄙人的这篇拙文就权当抛砖引玉之用了。

在“六四清场”后出逃西方，或者仍留在国内的那些自由派群体中，鲜少有真正尝试复盘这一历史事件线以探讨成功可能性的人存在——这群老一代自由派们除了在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时表达对中特政府当年敢于出动坦克的“义愤填膺”，对中国能够最终实现“自由民主”的继续幻想以外，再没有什么真正有价值的文字能够从这群人的嘴里吐出来了。

看在我要花大篇幅批判的份上，我帮你们这群老顽固复盘一遍：我们假设这群自由派学生认识到了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力量对于他们最终推翻中特统治目标的重要性，选择了与他们结成短暂的政治同盟——并且取得了成功。

如果此时的自由派仍然有着较高的政治水平，那么在首次多党制选举之前他们需要与曾经支持他们的中国无产阶级所推选出的代表建立一个过渡政府，根据我的推测后者极有可能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一、大幅放缓、停止，甚至部分逆转正在进行的私有化进程（基于无产阶级自身利益）；

二、基于前一条，保留现有的国营经济体制；

三、恢复自1988年起开始被取消的毕业分配制度。²

很显然没有任何一条是符合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受其影响的自由派也绝无可能接受其中的任何一条——接受这三条中的任何一条对于中国经济制度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自不必多说。

自由派在1989年运动中的势单力孤，加之其与无产阶级群众同盟的破裂以及在意识形态上的分道扬镳——失败是必然的。随着自由派“众望所归”的“第三波民主化”在中国的“碰壁”，“八九民运”知名人士的纷纷出逃，我们传统印象中呼吁“保护人权与自由”，力求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第一代自由派”们，至此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也许我们偶尔还能看见他们在西方媒体面前“哭诉”中特的荒淫无道，但也就仅此而已了。³

2. 这一点对于本站的许多同志们来说可能匪夷所思，我们只需要知道上世纪80年代处于泡沫经济中的日本也实行过表面上较为类似的制度就可以了。

3. 至于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在1989年不依托自由派的情况下获得胜利的原因同样是值得探讨的，但这并不是本系列文章的主要话题。

请客、斩首——收下当狗

电影《让子弹飞》中有这样一句台词：“请客、斩首——收下当狗”，这句话完美地描述了中资在毛主席逝世后中资政权对自由派的“三板斧”政策：请客，指拉拢自由派对文革反攻倒算；斩首，指镇压敢于挑战中资政权的自由派分子；收下当狗，指招安愿意归附中资的自由派分子。

在1989年中资用坦克告诉所有人“禁止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参政”后，绝大多数支持甚至参加了“民主化”运动的中国小资产阶级大都回归了他们的正常生活。这并不意味着小资产阶级大大方方地承认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失败——这种失败后的精神状态用“幻灭”一词描述更为合适。自由派在发现不能在政治领域寻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后就马上决定在别的地方寻找存在感，同时也为自己寻找一个出气口。

这个出气口在哪里呢？答案是：90年代中国国营经济的最后残余。鲁迅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小资产阶级在发现自己冲不动中资这个庞然大物后——就一转而成为了中特在意识形态上的忠实打手，将刀锋指向了无产阶级。

中资在1989年以后对待自由派的态度其实还是十分宽容的，并不如某些自由派分子或者民族主义小粉红所想象的那样残忍。只要不再像1989年那样再次质疑中资政权的合法性，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涉及政治体制，那么中资还是可以容忍他们的继续存在的。这一对自由派的宽容政策直到我们现在这位上台以后，在2015年左右随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戛然而止。

很快“大锅饭养懒汉”的论调又一次甚嚣尘上，这一次自由派小资产阶级还调来了右翼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民主主义者发动攻击时使用的弹药，很快中国社会就再一次充斥着“进一步私有化”的论调。最终在“私有化”的“高歌猛进”下，国营经济的最后残余最终于1997年被彻底消灭（即“大下岗”），在“大下岗”后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上除了又多出来一批失业的人口以外——还诞生了中国的第一批性工作者们，这对我们马列毛主义者乃至中国人民而言，都是不能忘记的新自由主义历史罪行。

总结：由于90年代与00年代恰逢全球新自由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的反动小资产阶级尽管在政治上不如意——在其他方面可谓是有应有尽有：经济上实现了完全的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已占据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亲近西方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社会气氛也油然而生。政治上虽然没有实现资产阶级多党制自由民主，但是能够看到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并与中国的学生市民对话对这些自由派而言也算是心满意足了。

但是，随着中资派出的大量公费留学生在学成后没有归来而是选择留在国外发展，以及2000年“推土机革命”与米洛舍维奇的下台，乃至2003年“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在贝尔格莱德的成立，这一切都预示着自1989年以后新一代自由派诞生的环境，以及他们的思维和行为逻辑。

二

“精神膜刑”与行为艺术 ——第二代自由派

在开始阅读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以下知识：

一、2000年在南联盟首都贝尔格莱德爆发并最终导致米洛舍维奇下台的“推土机革命”，是现代颜色革命的开端；

二、“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英文简称CANVAS）是由参加了“推土机革命”的塞尔维亚颜色革命组织“OTPOR”（塞尔维亚语意为“反抗”）创始人成立的颜色革命组织，你甚至可以在他们的官方网站出版物一栏阅读全套颜色革命教程。

中资自90年代起派出的公费留学生这一做法的最终结果可谓十分甚至九分地黑色幽默：这些留学生在学成后没有选择回国而是选择了留在国外发展。以现在的视角来看这群人毫无疑问是“叛徒”、“败类”和“利己主义者”，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谴责这些公费留学生个人而不是90年代起就占据着意识形态高地的新自由主义，就难逃“警惕海量个例”的逻辑矛盾与思维陷阱。

刚刚完成了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中特资产阶级政权派遣公费留学生赴外国留学，在各种意义上都是一步臭棋：8964的结局对于这一批留学生来说仍然记忆犹新，而占据他们脑海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又驱使着他们拜倒于西方核心国家的物质与精神。在西方核心

国家对同时期中国足以造成“降维打击”的物质资源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精神的双重打击之下——公费及自费留学生逐渐形成了第二代自由派的雏形。

第二代自由派与第一代自由派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在面对中国与西方巨大的差距时被打碎了膝盖骨，受了西方的“精神挨打”，却不敢再像后者那样挑战中资的统治合法性。

在八九六四的前车之鉴所带来的政治高压（事实上这种“政治高压”是自由派小资产阶级自己强加给自己的）与西方颜色革命的共同作用下——第二代自由派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开始变得扭曲：他们用一切自己知晓其含义但“孤陋寡闻”、“才疏学浅”的无产阶级人民群众不知晓其含义的象征物，比如某种特定的颜色或植物还是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来表达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含义（因为其他同阶级成员同样不知道）。顺着这个逻辑我们同样也可以试着去摸索2000年代“杀马特”等一众亚文化背后可能隐藏的政治含义。

第二代自由派分为两个部分：回国的跟不回国的。其中对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影响最大的是前者，我们话大篇幅重点讲讲：

受到过西方双重打击的第二代自由派小资产阶级在回国后，与亲戚周边人聊天的时候总是会不自觉的传播这样的一个观念：“西方好，中国不好”。这看起来很抽象，但是有着就足够了——所有在1990以及2000年代赴外国留学后归来的留学生，如果他们的思想没有在最近10年有任何的松动或者转变，那么他们就会在与周围人的交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与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同样地受到其影响的周围人如果认同或接受这一观点，那么他们就会重复这一步骤——久而久之便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整个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对西方核心国家的崇尚风气（无论这是否是盲目的）。

这是逆向民族主义反动思想在中国能够生根发芽的物质与精神基础，它的诞生从中国资本主义开始复辟的那一刻起就不可避免，日后还将愈演愈烈：

“他们懂什么是资本主义？最多倒退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是靠侵略和掠夺别的国家而积累资产的，他们敢侵略谁呀？”

总结：无法效仿西方建立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度，且无法上升为核心国家的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派小资产阶级——在面对西方核心国家的全方位攻势下，孕育出了逆向民族主义这一堪称祸害千秋万代的恶之花。而且到这里逆向民族主义问题的复杂性开始显著上升了：

依照红中网的理论，中国由于其庞大的人口以及其半外围“世界工厂”的性质，注定了中国无法上升为核心国家。这在一方面暗示了逆向民族主义是中国资本主义自娘胎里就永远无法摆脱的印记。且还由于“增长的社会契约”是中资赖以维持其统治合法性的根基，随着这一契约在未来变得越来越无法维持——我们不能排除大量不具备较高意识形态认知水平的反动自由派小资产阶级渴望西方核心国家用以实现阶级妥协的剩余资本，而在增长契约全面破裂后沦为彻头彻尾的逆向民族主义者。

三

互联网“键政”元年与新自由主义的“阿登反击战”⁴

在1989年自由派从中资政府那里获取更多政治权力的企图失败以后，经过近二十年的“话语权填充”，小资产阶级得以重新登上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舞台，并在北京奥运会的加持下——让2008年成为了中国互联网的“键政”元年。在这一段时期自由派主要集中在网络平台上的一系列言论活动，还因为中国资本主义“和谐社会”的改良措施而得以被部分允许。

而在外部，西方帝国主义在中东所挑起的所谓“阿拉伯之春”更是推波助澜，将中国国内的自由派浪潮推向了自1989年以来的最高峰——自由派又一次开始觉得借着“阿拉伯之春”的“西风”，民主必将像中东的黄沙般向中国奔涌而来。

然而他们的幻想又一次失败了：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在中东诸国所挑起的所谓“阿拉伯之春”（实为颜色革命），其所推翻的大多为本就亲美或至少不与美国高度敌对的国家政权（如埃及的穆巴拉克与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而后者在内战爆发前是个亲

4. 作者注：正文的内容是建立在读者充分了解小资产阶级“键政”行为产生的原因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因此在开始阅读本章内容以前请先阅读《论“键政”——看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情绪》这一文章：
<http://www.redchinacn.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276>

西方的政治家)。这使得后人在回顾西方在中东的这一所作所为时,感到难以理解甚至是完全无法理解其动机究竟为何,也许“亲美不绝对就是绝对不亲美”是相当一部分人脑海中所浮现的唯一答案。

那么这场由西方帝国主义发起的“阿登反击战”的代价是什么呢?答案是:绝大多数中东国家在经历“阿拉伯之春”后开始与美国和以色列明确敌对,部分国家(如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等)陷入了迄今仍无休止的内战当中。后来便有人拿出了安洁莉娜·朱莉在伊拉克的那句名言:“虽然民众一无所有,但他们有了自由!”(虽然这句话诞生于2018年)来讽刺“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国家的状况。

随着中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以及中国资本主义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经济“增长”,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浪潮作为这一情况的回应,同时也作为中资对国内自由派浪潮的反制——开始逐步抬头并登上政治舞台。许多今日的网络现象在2008~2012年这一段时期都能找到其雏形。

另外作为下一章内容的小插曲:2012年的重庆薄熙来事件已经表明,中资政府既不愿意听从党内外自由派的建议在中国实行完全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毫无进一步推行资产阶级改良政策的意愿。“和谐社会”作为胡温时代中资政府的“主题”,在我们现在这位上台后短短数年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四

中国资本主义对自由派衍生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废物再利用”

随着中国自由派的狂欢进入自1989年以来的最高潮，中资政府或许是出于对自身绝对统治地位的担忧——开始在各个领域重新打压自由派的活动。这一打压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当中民族主义浪潮的出现。

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民族主义思潮，即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其实算得上是中国自由派势力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副产物：因为中资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与自由派高度绑定的——也就是远航一号同志在过去回复红中网同志时所提到的“反共民族主义”。90年代的民族主义同今天的“亲帝左派”一样，以“反俄”为议题，主张趁着俄罗斯最为衰弱的时候出兵——一举收复外东北乃至蒙古国领土。在1999年美帝国主义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以后，“反美”虽然也被添加到民族主义内容当中，但是由于自由派在这一时期的强大势力，“反美”的部分遭到压制——“反俄”才是中资民族主义的主要话题。

尽管“薄熙来事件”意味着中资内部寻求社会改良派系努力的彻底失败，但广大中国人民由于中资实行的信息封锁政策，对这一事件的理解也仅停留在中资政府的官方通报上。而习近平在上台后初

期所采取的种种流于形式和表面的措施让未能看清中资实质的人们相信中资的路线即将回到“正轨”上去。

随着中资利用民族主义打压自由派势力的路线得到确定，原先在胡温时期得到极大发展的各类自由派群体所曾发表的各类无下限“亲美”、“媚美”言论被各路得到中资默认为的民族主义者纷纷挖出，并制成“合订本”供人民群众“欣赏”——这种情况在胡温时期是完全相反的。此种流于表面的打压举动更进一步欺骗了尚未认清中资本质的中国人民（甚至包括部分无产阶级），顿时习近平被各路民族主义拍马屁，捧为“毛主席第二”。

中资政府在2015年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盛大阅兵，更进一步强化了民族主义在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各路思潮中的领头羊地位——并将在未来中资积极打压自由派这条曾经养过的狗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资政府的整体形象，如果考虑到还尚有大量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的话——我认为2013~2015年间的中资政府形象处在一个历史高点，但具体是自哪一年以来的最高点我尚未能弄清，还有待探讨。

总结：本章内容由于所描述的时间段跨度极短（只有两年），且限于我本人对于这一时期的认知与研究——故篇幅显得过短，但是我依旧欢迎对这两年有着更深刻理解的同志们来探讨有关内容。

本章内容提出了一个在国内左翼看来十分离经叛道的观点：即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存在的民族主义思潮，本质上是自由派思潮的副产物，且由于在90年代自由派对于民族主义内容的话语权把持——使得中资的民族主义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与自由派思想存在着极大重叠。用网络上通俗的话讲：如果俄乌战争爆发后“左自合流”或者“神左合流”的话，那么90年代就是“兔自合流”或者“神兔合流”（“兔”在这里代指民族主义者，“神”则指代自由派）。我想这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在俄乌战争爆发后会出现“亲帝左派”、自由派和民族主义者在反对俄罗斯资产阶级的问题上达成惊人一致的问题。

换言之，中资政府“也许是”观察到了中国自由派与民族主义“师出同门”，且“一体两面”的这大大事实——但是人民群众却受限于自身的意识形态认知，仍将自由派思想与民族主义思想视为彼此间水火不容，遂出于打压自由派的需要刻意扶植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这在逻辑上就与“神兔二相性”达成了串通：我们可以尝试将对自由派的观察视角套在民族主义者身上，来尝试着解读为何会出现“神兔二相性”的问题。

五

“素人”与“老牌”

唐纳德·特朗普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似乎是这样的：他言谈粗鲁、态度强硬，不按常理出牌——却又是为了极致的利益做事；拥有常春藤大学的学位，演讲稿内容却是小学生和初中生的水平。特朗普在上台后的一段时间曾被外界普遍认为是美国开始走向衰落的标志，遭到来自全世界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政治家的嘲笑。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无论是自由派还是“强国”派，也都分别跟着由民主党和与前者有着密切联系的中资媒体对特朗普冷嘲热讽（中资媒体曾将特朗普的“政治素人”属性与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做对比）。殊不知这恰好暴露了中国小资产阶级在思想上不过是全球化大资产阶级附庸的本质而已。

特朗普向全世界证明了一点：在21世纪拥有“从政经验”不仅不是“必须项”，而且也不是“加分项”，甚至更有可能的——是“扣分项”。新自由主义早就不是那个自由派口中“优胜劣汰”的时代了，正相反整个西方世界的资产阶级政治，无一例外全都在往西方过去经常戏谑嘲讽的苏联“老人政治”转变。不仅“老”，而且“建制派”——选来选去就是那几张老脸，而其他更新鲜的面孔，不是作为建制派的钦定接班人就是受到压制（如德国另类选择党）。

如红中网的同志们所指出的，特朗普的政治思想是要将美国转化为一个两洋之间的民族国家，同时由本国人口垄断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品生产——从形式上讲更接近于回退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核心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产业以前的状态。这种做法在根本上就是反全球化的，不仅伤害了美国国内与全球化关系密切的大资产阶级利益，也极大地伤害了中资作为半外围国家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后者恰好以出口工业品为生）。于是本就关系密切的两大资产阶级集团一拍即合——开始在各自把持的媒体喉舌上大肆丑化特朗普的形象。再加上民主党“通俄门”无中生有式的迫害和建制派的广泛不服从和使绊子。特朗普在他执政的寥寥数年任期内就已经“众叛亲离”，但是他在美国的劳动群众当中已经通过自己的特立独行为自己赢得了声望。

对于中资这个“熟练运用廉价工业品冲击美国市场”的阻碍，特朗普的解决办法是显而易见的：用贸易战尝试提振美国的本土工业……

本章总结：特朗普作为美国资产阶级的“绝对另类”兼“政治素人”，其为美国劳动人民带来的新鲜感是不言而喻的。同样地，美国和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嘲笑特朗普未必就是因为特朗普这个人的性格与行事作风如何如何地不讨喜——我猜绝大部分也是跟着民主党和中资媒体的屁股后面无脑跟风黑罢了。这恰好向全世界人民说明了小资产阶级——各国的小资产阶级在各个方面都是亲全球化大资产阶级的附庸，尽管二者之间时常出现一些小打小闹。

2016~2018年也是中资民族主义宣传的强势时期，自由派的声音毫无意外地遭到了中资政权更高强度的压制——这么做的理由并非是什么“强国”派口中的“整肃思想”或者是什么“清除败类”这种冠冕堂皇的说辞，纯粹给自己续命罢了……

小布尔乔亚的一切都是廉价的：他们的道德感被资产阶级利用，却是一文不值；他们口中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在资产阶级看来不过是自身的意识形态再生产；在工作场所又因为自己高高在上的

傲人态度和对自己理想中的资本主义的无限追捧被无产阶级集体鄙视；在斗争过程中又不敢像无产阶级那样流血牺牲，或是像资产阶级那般做负隅顽抗——于是资产阶级逐渐意识到了小资产阶级人均和中资一样贪生怕死，遂开发出了“颜色革命”这种“不用流血牺牲”的“全新玩法”来满足这群无可救药却又无比可怜之人的幻想。举几张纸、拿几块牌子，“暴政”就会轰然倒塌——这简直就是量身订制！

我在文章的最后为我未来的更新做一篇预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这样的一句口号“亲不亲，阶级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针对一种思想的斗争显然已不仅仅是针对思想本身的斗争了——而是针对持有这一思想本身的阶级的斗争。就好像核心国家劳动人民反对“黑命贵”、“性少数”等政治正确并不只是反对这些政治正确本身，而是连同持有或支持这些思想的小资产阶级一并斗争了。同样的，在我们看来极度正确的全世界反帝人民针对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全球体系以及其走狗的斗争，也有可能以形式上较为“右翼”的方式进行。

六

美帝国制裁大棒始挥起 中资半外围凸钉终落平

一、什么是“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在中资喉舌媒体那里始终不称作“战”而称作“摩擦”，是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资产阶级政府，为打压中国这个以对内超高强度剥削劳动剩余价值，并积极向核心国家转移的半外围国家——所采取的一个历史性的步骤。就美帝“制裁”的执行细节而言，无非是利用核心国家霸主的地位，限制中资这个世界最大“代工厂”的关键原材料来源（比如芯片等），从而压缩中国资本主义在全球新自由主义体系中继续上升的空间以继续维持其半外围地位。

二、“中兴制裁”是怎么一回事？

美帝国主义对中兴的制裁，虽然也属于美帝制裁这跟“狼牙棒”上的一颗钉，但是它在中资舆论场上是打得最痛的那个：中兴在遭到美帝制裁后被迫接受后者全面监督的做法，在中资的舆论场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同时也将中国半外围资本主义企业的特点暴露无遗。

三、华为是一家怎样的企业？孟晚舟被捕又是怎么回事？

华为与中国国内无数电子制造商，在本质上并无任何区别：都是以对内超高强度劳动剥削，对外严重依赖核心国家提供关键材料生产电子产品的企业。关于华为的争议之所以在中国小资产阶级中造成人均“庸人自扰”的局面，无非就是因为那层“国家资本主义”的神秘色彩罢了。而孟晚舟被捕，则是特朗普政府“擒贼先擒王”策略的公开表现。

“中美贸易战”在中国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发展史上可谓是一个关键分水岭：它是对中国资本主义半外围地位的首次公开测试。无论测试方法、测试过程还是测试结果一律公开，而测试者则是核心国家的一把手——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资产阶级政权。从这场贸易战最终以中资完全接受美帝国主义开出的全部条件后结束的这一结果来看，毫无疑问美国资产阶级针对中资的做法，明显有利于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在中国舆论场上的进一步发挥：在自由派看来这就是中资“强国梦”的破灭。

但是这场贸易战就只对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在舆论场上有利吗？依我看也不尽然：它同样刺激到了那些还尚未认识到中国半外围资本主义本质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他们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标准，对国内像中兴、联想这样的“买办企业”大加鞭挞（实则遍地都是），然后对华为这种看似像是走了点“国家资本主义”，吃了点“苦头”的企业，大肆吹捧。那自由派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反面，自然也要加入到对华为的“讨伐”当中。

一部分细心关注中国舆论，尤其是互联网舆论风向的同志和网友们可能发现了：中资政权在贸易战结束后就大大加强了其民族主义宣传的力度。原因无他，就是因为贸易战的结果显然是在论证自由派的观点。顺带一提，如果将贸易战时期自由派对中资政权的判断，同今天自由派为了贬低俄罗斯资产阶级政权，而无节制地吹捧

中资的做法相对比，就会发现自由派的这一转变，符合我很早就在论证的“民族主义和自由派一体两面”的判断。

到最后，我做出我的判断：中国小资产阶级成员间民族派与自由派的斗争，自贸易战后就已经进入了“垃圾时间”——因为无论是自由派还是民族派都无视了一个根本事实，那就是“中美两国资产阶级高度勾结”。只有意识到两国资产阶级高度勾结的事实后，小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才有叩开左派思想大门的可能；再来看看今天中国互联网上支持基辅纳粹政权的那帮“伪左”们，他们对中资的认知是基于自由派的，明明中资就是站在美帝国主义和北约帝国主义这一边的，明明根本就没有给俄罗斯贡献过什么剩余价值，他们却还要大书特书，说中资是什么“黄俄孝子”——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令人忍俊不禁。

贸易战结束后，中国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自由派进入看似无节制的争斗，实则“庸人大大地自扰”，完全是“垃圾时间”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双方都进入了“抛开事实不谈”的意识形态宣传状态。这一状态在中国互联网上的表现就是民族主义和自由派各自搭建的“信息茧房”：偏向自由派的内容评论区你见不到一个民族派，反之亦然。